

1307

# 情洒順昌

——福州知青回忆文集

順昌文史资料第十四辑

福建省順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# 岁月留情

(代序)

林炳秋

曾经有一批热血青年受时代的感召，为了实践一个豪壮的誓言，来到广阔的天地，投入大山绿色无垠的怀抱，呼吸土地潮湿而温热的气息，用青春的汗水、热血，种下他们的希望与理想，四千多个躁动不安蓬勃律动的灵魂，在日落与日出中释放和付出他们的精神与意志。

曾经执着过，曾经迷惘过，曾经失落过，但是，青春没有寂寞！在生存和发展的渴望驱使下，他们没有屈服，他们思考着，探索着，追求着，拼搏着，几经沉浮，顽强地站立起来，稚嫩的肩臂托起命运。

而今，他们正迈着沉稳的步伐投入时代的洪流，成为中坚，成为骨干。回首往事，不禁惊叹那份承受艰辛与困苦的坚强意志，竟深深得益于广阔天地中磨砺之后的深厚积淀。感谢生活！知青无悔！

往事如烟，岁月留情。今天，当他们再次面对这一片热土，他们无法平静，激动的脚步又一次急切地奔赴山乡，奔赴田间，奔赴农舍，奔赴朝夕相处、相濡以沫的亲人。为这梦魂牵萦的一切，他们再度奉献

了慷慨与赤诚。真情与爱恋流露于言语，倾诉于笔端，汇聚成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的五采华章。收获这份凝炼与厚重，对于历史，对于现实，对于未来，无疑都是值得欣幸的。

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，为了收录当年广大福州知青在顺昌农村社会实践锻炼成长的事迹，籍以激励年轻一代为顺昌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，开拓进取，决定征编出版当年在顺昌插队的福州知青回忆录。经一年多的努力编成此辑。为了表示对出版这个专题史料的良好祝愿，谨以此文权当序言。

(作者系顺昌县政协主席)

# 目 录

- 岁月留情（代序） ..... 林炳秋（1）
- 永远的思念 ..... 潘新和（1）
- 岁月难割乡情 ..... 黄可明（12）
- 当年——我们也快乐 ..... 盛胜利（14）
- 海龙 ..... 郭祥明（29）
- 初为人师时 ..... 华捷（45）
- “插青”漫忆 ..... 管旬辉（49）
- 在阿根廷的西行列车上 ..... 管旬辉（52）
- 插队断忆 ..... 蒋晓勤（56）
- 农舍琴声 ..... 刘安丽（66）
- 结 合 ..... 刘安丽（69）
- 惊涛拍岸昨日潮 ..... 潘亚明（72）
- 不忘猪笼草 ..... 施晓宇（75）
- 我记忆中的知青楼 ..... 施晓宇（78）
- 回忆我的学生 ..... 施晓宇（81）

斗笠的温馨 .....	施晓宇 (83)
病 中 .....	施晓宇 (86)
赶 墟 .....	施晓宇 (89)
冷寂的辉煌 .....	乔 梅 (94)
一段缘 .....	江慧萍 (121)
难忘的岁月 .....	曹有秋 (128)
“依耶”——母亲 .....	赵宗耀 (136)
人生转折 .....	林天雨 (140)
生活，象深红色的玫瑰 .....	李嘉琳 (147)
大山深处 .....	刘 牛 (169)
追忆耕耘的岁月 .....	潘 亮 (207)
难忘的青春岁月 .....	上白知青 (212)
上白知青聚会文摘 .....	上白知青 (214)
附：	
顺昌县上山下乡人员统计表 .....	县档案馆 (221)

# 永远的思念

潘新和

从16岁到22岁，我这一生中最宝贵时光是在顺昌度过的。岚下公社夏墩大队的风霜，漂白了我如梦的青春，如诗的年华；在那里，我初尝人间百味，世事艰辛；我诅咒过它，我也眷恋着它。那是一份无法褫夺、永远也读不尽的记忆。

## 到夏墩落户

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忘记这个日子：1969年2月9日。这是福州16中首批学生到顺昌插队的日子。火车到了建西站，走过贮木场转乘森林小火车，在那里见到了大队派来接我们的干部，一问，才知道我们将要在岚下公社夏墩大队落户。“夏墩”这个陌生而又新鲜的村名，就从这一刻起，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小火车驶离车站，在山水田园中穿行了两个多小时，途经大历公社、岚下公社，直至客运终点站，才听说夏墩到了。我们赶忙下车，只见许多村民迎了上来，帮我们拿了行李，一路呼着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，“广阔天地，大

有作为”的口号，簇拥着我们，来到了大队部。在那儿稍事休息，我们12人（陈轼、王世文、阮世明、吴彬杰、王孙惠、郑衡、陈卫东、陈亨梅、陈淑荣、赵文营、潘新中、潘新和）被分成两拨，送到两个知青点住下。

我，我的哥哥潘新中，赵文营3个人，住在黄金忠家里。老黄头是一个很和善的村干部，听说“文革”前曾担任大队长，后来自然成了“走资派”，靠边站了。我们住的是他家的厢房，泥土地、木板墙，屋里摆了3张床和1张小木桌，就有点转不开身了。房间很暗、很潮，床板和草席常年发霉。跳蚤和老鼠，也是这屋里的“常住户口”，且“人”多势众，气焰嚣张。我们在这屋里一直住了三四年，直到村里盖起了知青楼，才恋恋不舍地搬了出去。

我们的厨房设在隔壁的钱有生家，老钱当时是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，他的妻子，那时也就40岁不到，我们都很正式地称她“老何”，而不称她“何嫂”。夫妇俩都很随和、纯朴。我们这个知青点4个人（另一个是女知青陈淑荣）在他们家的大厨房里安了一口灶，一张桌，搭伙做饭。几年来，我们跟老钱一家朝夕相处，互相关照，十分融洽。我们这些刚离开家庭、什么都不懂的小青年，全套的过日子的手艺，几乎都是老何把手教会的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老何教我们做“浇菜”。那时我们常常断油，老何就教我们做不

用油的菜，她把芥菜洗净切好，放在沸水里煮熟捞起，浇上一些米汤，再下点盐巴，一碗“浇菜”就做好了。因为米汤的缘故，没油的菜吃起来就不觉得那么涩。

那年的春节是2月16日，来到夏墩没几天就赶上了过年。队里的农民给我们送来了冬笋、白棵、猪肉……，除夕夜，我们两个知青点的同学，聚在一起包了冬笋、猪肉馅的饺子，过了在农村的第一个“革命化”的春节。我们的心里都充溢着开始新生活的喜悦。

正月初二，我们第一次参加劳动。天寒地冻，下着绵绵细雨，我们和队里的农民一道，扛着半圆形的“山耙”，来到村口小溪旁的那块地，任务是平整秧田、播种。第一次下地没有经验，穿着厚厚的裤子，临到下水田，裤腿怎么也挽不上去，看着冰冷的泥水，心里直犯怵，无奈，想到是来接受“再教育”的，只好一狠心踏进烂泥田，一边冷得发抖，一边学着农民，把牛耙过的地整平……，一个上午下来，溅了满身满脸的泥浆，又饥又乏，蹒跚着步子回家吃饭。当我身上淌着泥水，赤脚八叉地招摇过村时，迎着村人的目光，忽然感受到“滚一身泥巴”的荣耀，精神为之一振，饥饿和疲惫一扫而光，心想只要能“脱胎换骨”，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### 真正的考验

其实真正“脱胎换骨”的劳动还在后头，那就是

“双抢”。“双抢”就是“抢收抢种”。闽北无霜期短，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割起早稻，插下晚稻，否则晚稻就可能颗粒无收。所以，“双抢”是一年中最繁忙、劳动强度最大的时候。而“双抢”一般在七月份，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，经过一场“双抢”，是得晒脱几层皮，累掉几斤肉的。

“抢收”，队里让自由组合，我们兄弟俩自然是最佳搭档。一早，我们就挑着箩筐下地，一到田里，我就头也不抬地猛割，我哥就紧跟在后面猛打，打满了两担谷子，就挑回队里，过秤记工分。一担谷子，我可以挑起一百四五十斤，我哥膀大体壮，可以挑起一百七十八十斤。我们上午每人打两担谷子，下午每人打一担谷子，就可以算得上合格的全劳力了。

最辛苦的还是“抢种”。“抢种”时由队里统一开伙。天刚蒙蒙亮，大约早上四点来钟，外面就吆喝着起床吃饭。我们挣扎着起床，直到吃完饭，才睡意渐消。于是匆匆挑起竹筐，来到秧田，一手拔秧，一手用秧梳把秧苗根部的泥土梳洗干净，用稻草扎成一束，整整齐齐地码在竹筐里。太阳出来时，我们就挑着满筐的秧苗到地里插秧。

插秧是一项技术活，没想到我居然在这方面很有点“天分”。我插的秧又快又直，转眼间就把两旁的农民兄弟给远远地甩在后面，队里没有几个人是我的对手，一排秧插过去，我会快一般人两三棵。为了维护

这份骄傲，我一点不敢懈怠，连伸一伸腰也怕耽误了时间，为此，我赢得了一大堆赞扬的话，有笨拙的竟然还要我教他一手，那时啊，我的感觉真是美得没法说。

中午吃完饭是没有午休的，马上得再去拔秧。这就远非早上那趟可比。晒了一个上午的秧田，水热得烫脚，干了一上午，腰已经酸疼得伸不直。为了减低身体的高度，使腰不致弯得那么厉害，我常常是跪在秧田里拔秧。头上是如火的骄阳，脚下是发烫的泥水，上下夹攻，不一会儿，便全身汗湿，找不到一处干的。有时累得眼前发黑，也只能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。——那时我们就是这么虔诚、自觉、毫无怨言地接受“再教育”的。在往后的岁月，我只要想起那头顶烈日跪在热水田里挥汗如雨地劳作的情形，便能坦然地去面对任何困难。

摸黑收工回家，还往往要去队里参加“政治夜校”的学习。在一窜一窜的煤油灯光下，我强打精神给农民读社论、读文件。为了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有时还要揪出几个“地富反坏”去批斗，批斗会在大队礼堂里开，遇到这样的“宝贵”机会，我这个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会被指定上台发言，以示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。在“阶级斗争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”，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的口号声中，我“义愤填膺”地上台批判阶级敌人的罪恶行径。待到心力交瘁地回到

家，躺上床，还睡不踏实，就怕第二天早上醒不来，误了上工。

在下乡的6年中，无论我怎样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可我始终没有得到过一次的表扬和奖励，因为在那时，“可以教育好”就意味着“永远也教育不好”！

### 找到我自己

下乡两年后，知青开始“上调”。第一个走的便是和我同住一室的赵文营，去的是在建西的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第13团警卫排，那时我们是多么眼馋他啊！后来是王世文去龙岩煤矿，王孙惠去福州皮革厂，陈轼被推荐上了厦门大学……，每逢有人“上调”，我既为他高兴，又感到内心负荷的加重。那天，陈轼要走了，我们帮助他行李搬了出去，装上小火车，看着那行李上贴着的“厦大经济系”的标签，我真羡慕得要死，这是怎样一种撕心裂肺的羡慕！今天的人们，恐怕是再也无法理解我当时的感受。

后来，我哥哥也在艰苦的努力下，调到了富文钢铁厂当了一名炉前工。到了插队的第5个年头，第一批到夏墩的老知青已走得所剩无几，也许是“山中无老虎”吧，默默无闻的我开始受到“重用”。

1973年公社召开知青代表大会，公社居然通知我去为会议整理材料。虽然我没有资格作为大队的知

青代表，但能让我去参加筹备会议，这对我来说自然已经算是一份殊荣了。

会议前一周，我就去公社报到，报到后才知道，和我一起筹备会议的只有两三个人，其中有一个是公社的干部，好像是小曹。我们几个抄抄写写，天天都忙到很晚。我把我们整理的“知青工作总结”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好，抄了十几二十张的纸，把公社大门对面那堵墙贴得满满当当的。与会代表的发言稿，大多经过我的修改润色，有的文章改动相当大，几乎等于重写了一遍。开会时，我听着那些经我改写过“熟悉”的发言，心里的舒坦劲就别提了。当然，这点得意转瞬即逝，重要的是，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，我发现我能写。

1974年，公社在阳墩（1981年更名黄墩）大队搞农田基本建设，每个大队都要派大批人马去。大队叫我负责宣传工作随队前往。以往参加“学大寨”，我都是作为“全劳力”去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当“脱产干部”，真有点受宠若惊，领导的信任使我干劲倍增，暗下决心要出色地完成任务。

每天一早，我和大队通讯员一起，抬着扩音机、大喇叭来到工地，找个地势高的地方，爬到树上安好喇叭，就开始播音。广播的稿件，除了公社下发的文件外，就是我自己写的通讯报道，主要是宣传先进事迹、通报施工进度等。我集播音员、记者、编辑三任于一

身，常常是播完文章，让通讯员放音乐，自己就下工地采访、搜集材料，回来就坐在山坡上写稿，写好马上就再拿去播。有时还抽空到工地干上一阵。虽然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，可干得带劲。

有一天播完稿件，坐在草地上，突然心血来潮，想写诗，想写一首长诗。于是就趴在地上写了起来，诗写得很快，不过一两个钟头“长诗”就问世了。说实在的，那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作诗，只不过是把文字分行排列起来罢了。标题已经忘记了，内容大约也就是“战天斗地学大寨”之类。写好就拿去播，播出之后不知怎的竟让公社知道了，被索去在公社广播站播出。——按说这事也就到此为止了，没想到在我已调回福州好几个月，早已把这事淡忘了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份寄自顺昌的邮件，拆开一看，原来是一本顺昌县文化馆编的文学刊物，里面赫然登载着我的那首趴在草地上写的蹩脚透顶的“诗”，这首诗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为我的第一次面世的作品。可惜如今这篇处女作早已不知去向。

从工地回来后，我又迷上了写小说。写得废寝忘食如痴如醉，在消费了大量的稿纸之后，有一天，一个知青哥们到我那儿玩，读了我的“大作”，半是崇拜半是惋惜地说：“你是上大学的料。”说得我一怔，心里发酸，差点眼泪就下来了。我发誓：我一定要上大学！

3年后，1977年，只读过初一的我，成了恢复高考制度后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，在入学的第一年，我又顺利地通过了“写作”、“文选”两门课的免修考试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段艰难时日结下的“文字缘”。

### 踏上不归路

插队的最后一年，1974年初，我当上了民办教师。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它竟影响了我终生的择业，使我走上了从教这一条不归路。

当时知青当民教的已经很多，原先我总是担心自己学识浅薄，当教师会误人子弟，所以一直犹豫不决。及至打定主意去试一试，本村的小学教师已满员，公社让我去离村十里以外的黄墩大队罗常生产队任教。

这是座落在群山之中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。我所在的夏墩地处盆地中的小平原，去罗常则是“步步高”，要一直爬一个多小时的山路，一路上常常看不到一个人影，走到那儿已是汗流浹背，要休息好一阵才缓过劲来。

罗常生产队大约二三十户人家，上学的孩子20个左右，因为山高路远，教师都不愿来，村里的农民见到我也就特别热情，马上整理好教室，叫孩子们来上课。教室里高高低低坐了一大片，年龄从八九岁到十四五岁不等。一问，才知道他们共有4种程度。于是，我把他们分成4个班，分坐在两个教室里，俨然

当起了孩子王。——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，那时我怎么可能给4个年级的孩子同时上语文、数学，还有音乐、美术、体育这么多的课呢？放在现在，说什么我也不敢去。

我每个星期都要在夏墩——罗常之间往返一次。我得回夏墩背点粮食吃上一个星期，顺便看看有没有家人和朋友的来信。我一般是在星期六下午去参加黄墩大队中心校的政治学习后，走将近20里的山路到夏墩，星期天下午再背着粮袋翻山越岭去罗常。在罗常，我自己砍柴、做饭。在生产队队部厨房可供二三十人吃的大锅里，煮够一个人吃的、刚盖住锅底的饭。菜就很简单了，买点青菜、马铃薯，下点油盐一煮，就能吃上一天。最好的荤菜就是买上一元钱六七十个的鸡蛋，这往往是在有知青朋友来的时候。有一次队里杀了一头牛，分给我一两斤的牛肉，因为好久不沾荤腥了，心里很是高兴。不料这牛肉却怎么也煮不烂，食之难咽，弃之不舍，经过好一番努力，才总算没有“暴殄天物”。

这年暑假，公社派我参加顺昌县教师进修学校办的体育教师培训班培训，10天左右，培训班结业，我被调回夏墩中心校任教。教的是体育和四年级的珠算。体育课无非是做体操、打篮球、跑步之类。教起来并不费事，但珠算却很麻烦。因为我以前没学过珠算，连算盘珠怎么拨都得依样画葫芦，只能现买现卖

了。而农村又最重视珠算，看着孩子们那殷切的目光，我就一点不敢怠慢。天天一早起来先背口诀，然后是对着书本拨算盘珠，一遍一遍练习到纯熟为止。到了学校还要在教学用的大算盘上将例题再演练一遍，唯恐上课时出差错。——我从小到大数学一直是稀里糊涂的，大约我在语文方面有多聪明，在数学方面就有多笨，更不用说我连碰都没碰过的“珠算”了。但作为一个民办教师是不能说“NO”的，缺什么就得教什么，教什么你就会什么。

从通往罗常的那条山路走到现在，时光已流逝了20多年。这期间，我当过中学老师、大学老师，但我从没有忘记我是从当民办教师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的，我对那些默默奉献的乡村教师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。我常常惦记着我当年教过的孩子们，如今他们早已长大成人，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曾经有过的一个潘老师。……

人到中年，闲下心来，时常会想起那遥远的日子。多少次梦里走过夏墩那摇晃的木桥和大鹅卵石铺成的村道。心灵的创伤，早已平复；所有的苦涩，都已变成甜美。那片我曾经生活过的土地，留给我的是真诚的感谢、永远的思念！

（作者原福州十六中学生，曾在顺昌县岚下乡夏墩村插队，现任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副主任、副教授）

## 岁月难割乡情

黄可明

星移斗转，苍海桑田，25年前，做为知青的我走出了山青水秀的东郊村。从此，不论我身居福州、北京，还是在异国他乡的欧洲，夜深人静余暇空闲之时，脑海里时不时会闪过东郊村那山山水水与父老乡亲。

忆往昔峥嵘岁月稠，我们知青与村民同甘共苦战天斗地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东郊村的每一道沟坎，都曾有过我们深深的足迹；每一块土地，都曾洒下我们辛勤的汗水。在那个“火红的年代”里，我们有过追求，也有过失落，有过欢乐，也有过忧愁，有过友爱，也有过孤寂。我们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，经历了人间的风风雨雨。20多个春夏秋冬，弹指一挥间。1995年国庆节，我与众多知青汇集阔别20多年，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，旧地重游，老友相聚，促膝话旧，慰离情，敦友谊，共忆那段难忘的时光。

想当年，我们是年轻的，许多夜里，我们梦见自己跨过了一道金光闪烁的门槛，看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我们是脆弱的，就象温室里的花草，一旦失去庇护，就有枝折花落的危险，我们渐渐发现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也有许多寂寞，许多坎坷，许多荆棘。行